

Column

■ 困学集

经济学家慎言 恰能构成有力制衡

——危机启示录之一

◎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毫无疑问，现在全球正面临着巨大的金融危机，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华尔街的神话在人们面前轰然倒塌，大量的财富灰飞烟灭。投资者也好，企业家也罢，个个都极度沮丧。前路漫漫，是否还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危机是否可以提前预示？提前避免？经济学家们开始进入沉思。所幸，现在的经济学已不是费雪时代的经济学，现在的经济学家也比费雪更谨慎。当年费雪做出足以毁灭其一生的财富和幸福的预言，已经深深烙入现代经济学家的脑海。稍稍明智一点的现代经济学家，已不再轻率发表预测性言论。但这不等于说经济学家就该躲进书斋，回避对经济现实的看法。

很多人都问同样的问题：经济学家是不是很没用？每次危机来临，似乎都无法预料，也都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案。在一般人看来，经济学家就应该和高明的医生一样，药到病除。尤其是，很多人幻想经济学家应该就隐士般的老中医，只要一搭脉，或者如小说中所写，只要摸根红线，就能够判定病人的病情。让人失望的是，再厉害的经济学家似乎都缺乏这种本事。每一次危机来临，经济学家们都还在犹豫，并且非常谨慎的判断经济趋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研究越深刻、知识越丰富的经济学家，言谈则越谨慎。当某一项对老百姓或者企业家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出台之前，总会面临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

经济学家的这种怀疑态度并不表明其一贯的与人作对的立场。这种怀疑只不过是经济学家慎言的体现。如同人们常说的，知道得越多，反而越感觉自己的不足。当布什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时，100多名美国经济学家署名反对。国内一些人就此发表文章，要么盛赞这些经济学家的“良知”，要么批评这些经济学家的“先知”。前者的理由是，市场有其自身的波动和内在调节机制，

当布什政府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时，100多名美国经济学家署名反对。他们反对什么？仅仅是一个救市方案吗？不是。经济学家所反对的，从本质上来讲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自身最根本的局限性——理性不足，反对的声音恰恰体现了观点多元化对人们自身理性不足的弥补。经济学家的反对声音有助于政府克制对自身理性的幻想，并有助于政府认识到自身的局限。

制，政府救市只会帮倒忙；后者理由则更为可笑，认为保尔森和伯南克原本就是对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理解极为深刻的专家学者，而署名反对的经济学家们多半不懂货币金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都在用某种过激的言论来博得眼球而已。

这些经济学家反对什么？仅仅是一个救市方案吗？其实不是。如果布什政府推出一个不救市的决定，同样会遭致另一批经济学家的反对。白宫无论推出哪种政策，都会面临反对的声音。经济学家所反对的，从本质上来讲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自身的最根本的局限性——理性的不足，反对的声音恰恰体现了观点多元化对人们自身理性不足的弥补。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就是此意。国内的一些人恰恰没有理解观点多元化的重要性和本质。一听到有反对声音，就以为这些经济学家在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前提下维护对市场的信念。这恰恰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误解。也许这些人已习惯于一种声音的世界，只要听到有不同的声音，就表现出神经质。

实际上，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在经济问题的理解上完全达成一致。能够达成一致的，比如曼昆在其畅销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所总结的十大原理，也仅仅是代表了经济学家在一些最基本问题上的共识。而对于更多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要

达成共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种分歧恰恰说明了：第一，现实世界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第二，经济学家也是普通人。这两点其实也内在相关。如果这个世界非常简单，那么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够给出很透彻的理解；如果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如果经济学家是超人，同样也能够给出清晰的解读。遗憾的是，现实世界太复杂了，而经济学家再怎么努力去创新知识，也只能试图穷尽其中的某一个角落而已。

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只要是人，就存在理性的局限。在理性的约束下，即便习得深厚的专业知识，或许可以弱化该局限，但也不可能强化它。道理很简单，越专业的人士，目光反而越狭窄，所谓一叶障目。经济学家仅仅在自身的领域中体现出某种敏锐性，水平越高的经济学家这种专业局限会越大。但相对于现实世界来说，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不仅仅是影响一个领域。以美国这次推出的救市方案为例，该方案看似救助房地产市场和华尔街，实际上同样会影响到家庭和其他实体部门。但对于保尔森和伯南克领导的政策团队来说，同样会面临专业的局限，也就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负面影响。100多名经济学家的署名反对，恰恰是对布什政府救市方案的一种修正。也正是很多人的反对，才使得救市方案更加谨慎和完善。

天气预报经常报不准，地震预测就错误更多了，但能否由此就断定天文和地理学家都很没用呢？天文和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有限理性对复杂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窘境在不断推动着科学的进步。经济学家知道自己的局限而慎言，反映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逐步成熟。而经济学家的这种慎言恰恰对政府构成了一种最有力的制衡，即经济学家的反对声音有助于政府克制对自身理性的幻想，并有助于政府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经济学家在这种作用并不在于其是否是某某主义者，而在于其是否作为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经济学家的分工是多元化声音的基础，也是观点制衡的前提。也正是这种分工，才使得各种过激的行为得以遏制。



■ 金融城事

香港联系汇率制何去何从

◎ 李华芳
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透视华尔街金融大风暴，世人已经看到，这一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究竟后果如何到目前还不能完全明了，但事态的严重性已然超过了美国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以及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颓势难救，而且恐怕也将维持一段时间。一般来说，经济的走势决定该国货币在汇率市场上的表现，如果经济不景气，通常在汇率市场上这种货币的价格就会下跌。通俗而言，就是不值钱了。因为在货币背后，已经缺乏强劲的经济走势作为支撑。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本身没有价值，甚至只是符号表现，但这些货币之所以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政府信用担保。在经济走势平稳或者强劲的时候，货币对应的政府信用被接受的程度就非常广泛。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创立于1983年，其背景是1982年撒切尔到京与邓小平就香港的前途进行谈判，而市场担心香港的前途不明，连带对港币的信心动摇。从1982年7月1日到1983年6月30日，港币对美元贬值了18%。之后，港币一路急泄，到9月24日跌至9.6港元对1美元的历史最低点。许多商店开始拒绝接受港币。在这种情况下，港府下决心改变浮动汇率制为联系汇率制。

这一制度主要是两个方面。先从1983年10月17日起，汇丰和渣打两家港岛发钞银行在发钞之前应先向外汇基金缴

纳等值美元，以换取“负债证明书”作为法定发行准备。港元和美元的汇率固定在7.8:1。发钞行业可以用“负债证明书”和港币向外汇基金赎回美元。再是撤销港币存款利息税，这一制度多少挽回了一点信心。由于对香港政治前途的担忧而造成的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价格暴跌，大量资金外逃引致港币大幅贬值的态势得到了遏制。当然，按照徐志刚和钱刚在《香港金融制度与经济》一书中的说法，港币的最后稳定得益于中英两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努力，但为联系汇率制度记上一功。

联系汇率制度自此在香港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发展历程。本质上，这并非得益于该制度有多灵活，而是得益于美元的长期稳定。即便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香港之时，新生的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旧坚持联系汇率制度不动摇，这一选择尽管给了投机者机会，但并没有多少腾挪转移的空间，香港也因此因此在金融危机中受损不算太大。当然，对港币的投机之所以未能获得成功，还由于内地对香港的全方位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当时也是与美元挂钩的。

1998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第67条中指出：保持香港经济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是联系汇率制度，再次清楚表明政府维持联系汇率的决心。放弃联系汇率制度，很可能导致大量资金外流，把利率推到更高水平，甚至引发港元信心危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联系汇率制度都是本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后来在千禧年新年致辞中提到：以往这类场合必定碰到的问题，就是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是否会维持；但今次这问题不再出现，是个好兆头，实在令人鼓舞。这反映人们对联系汇率制度已经非常有信心，亦深信我们有能力维持这个制度。

其实不难发现，维持联系汇率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持港币的稳定，而美元是一段时间内最为稳定的货币，盯住美元就相当于找到了个锚。张五常曾在赞扬内地当时的货币政策时，也强调这一“货币下锚”的理论。其核心的观点就是，货币背后是信用，这个信用归根结底要靠一篮子商品作为对应。只要这个篮子内的东西保持稳定，那么币值就会稳定，就相当于下了锚，船就稳。而张五常之所以盛赞中国奇迹并且认为这一货币制度天下无双，也是建立在人民币盯住美元时，美元非常稳定。

但形势正在起变化。次贷危机或许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而美国经济的动荡将会持续。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美元的替代品还非常困难，但并不是全然没有，欧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呼声也时有耳闻。也就是说，要继续维持联系汇率制度，就得要搞清楚维持这一制度的目的所在。既然目的在于维持港币币值稳定，如果挂钩的货币已经是不稳定了，那么维持联系汇率制度就背离了其目的。

或许是时候重新考虑联系汇率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了。尽管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但货币背后所依赖的信心一旦遭遇危机，货币币值就会不稳定。对于港币而言，这也是一个反思当前固定汇率制度漏洞的契机。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对一个国家而言，不可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个经济目标。港币正面临这个不可能三角的困境。

如果汇丰集团可以搭载可口可乐的供应链，中国果农产业或可以浩浩荡荡输入到亚洲、美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这将从总体上带动中国的果农产业，到时将有可能有几千万户果农受益。想想吧，那不就是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么？

■ 排沙简金

若能加入世界一流公司敏捷供应链……

◎ 王育琨
管理专家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20年前那本影响了许多人的《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对目前中国国内夹杂着诸多民族主义的议论感到有点烦躁。

在这位未来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及近几年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既带动了国民经济，又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形象。尤其是北京机场第三航站楼和奥运会的旷世盛典，给正在研究中国大趋势的奈斯比特一种莫名的兴奋。历史上20世纪20至50年代的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兴建了一系列里程碑工程，向世界展示着她的志向。这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建设工程。

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极转移到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可是，与这种大趋势相悖的是，亚洲国家却同样在崛起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奈斯比特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有开阔的视野，更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对可口可乐这样全球化的公司，大可不必打上哪一个国家的标签，中国人高兴，可以投资可口可乐股权。

奈斯比特虽然年近80，但却不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有一双童真的

眼睛。确实，世界本来已被瓜分完毕。中国现在开发出一个新的增长极，给利益格局既定的世界带来了冲击。如果我们恪守自力更生，列强最欢迎。而中国恰恰是在向全世界开放的过程中，也逐步全面融入世界消费品、制造业、资源业和航天业等等。可以说，中国是这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或许正是出于此种考虑，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公司并购美国品牌百般阻挠。

记得19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刚刚有了起色，可是遭遇世界列强的诸多堡垒限制。当时美国人很清醒，打出的旗帜是“门户开放，利益共享”。今天的中国跟当时的美国所处环境差不多。我们不能顺着列强的保护主义，一味强化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提出新的口号，树起新的旗帜，这是历史赋予后来者的使命和责任。处在冲锋势头上的中国公司，应该有信心竖起全球化的新旗帜；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我们当然知道，这还不是真实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怀有梦想。美国本来已经很强大了，他可以不断发展位置。而对我们就不一样了，不发展，诸多矛盾无法解决。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比美国开放更主动。因为美国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需要维护，而我们新兴市场、新兴国家，没有那么多要死守的东

西。这是我们贫弱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优势。

新兴市场无需死守是优势。可口可乐以25亿美元的出价，全盘接受汇源果汁，这是可口可乐历史第二大并购，也是进入中国市场80年来的一笔投资。我们正好可以借用汇源果汁的收购案，撞开美国同等对待的大门。不能因为他们不按商业规矩办，我们也不跟他讲商业规矩。这样彼此制衡，将来两败俱伤。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汇源果汁收购案，是次难得的全球化洗礼，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送上门来的一张入场券。中国公司焉有拒绝的道理？

已经连续两年遭遇现金流困扰和今年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的汇源果汁，不得不在艰难的困境中，自谋出路。而朱新礼认为，这次出售汇源果汁，并不是企业遭受严重危机后的放弃，而是他在新形势下的进攻，是为了一系列上游产业拿到了一张全球顶级供应链的入场券。从果树种子、苗子、果园、水果加工、果汁灌装，到消费者的货架，一直到品牌和营销网络，汇源集团有着一个很长的产业链。这次出售的汇源果汁主要做终端业务，主要是果汁、饮料和灌装。上游还有果园、果树、苗子、种子，水果加工很长的部分。汇源集团还有6000多个员工，还有近20个工厂在做前端业务。农民出身的朱新礼，现在最大

梦想就是经营果园和水果加工等上游业务。他说，大家都知道农民比较穷，农村还是比较穷，中国的农业还是比较落后。我从出来创业的那一天起，就想能够为农民做点事。好好去做果树，搞水果加工，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可以大有作为”。

全球化竞争锁定敏捷供应链。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不再是单一公司与单一公司之间的竞争，甚至也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敏捷供应链与敏捷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对于后起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加入世界一流公司的敏捷供应链，那是需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的。一大批民营企业的心志是：能够加入丰田的供应链就好了”，能够加入苹果的供应链就大吉了”等等。有时即便加入了，也是一些辅助配件的供应，而不是产品线整体上的切入。这一回，汇源果汁却是中国民营公司的产品线整体切入，员工、管理层、200多万户果农、渠道商都会因为加入一条全球分布最广阔的供应链而雀跃不已。

如果汇源集团可以搭载可口可乐的供应链，中国果农产业或可以浩浩荡荡输入到亚洲、美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这将从总体上带动中国的果农产业，到时将有可能有几千万户果农受益。想想吧，那不就是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么？

■ 知无不言

中国增长模式的脆弱性

——兼议内需驱动的两个约束条件

◎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这是个话题，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优化。增长与发展，在经济学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主要基于总量意义，另一个是就结构改进而言的。有增长，未必有发展，但发展一定是以增长为基础。

作为中国经济持续30年平均9%的增长结果，中国已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随着市场的扩展而出现了政府与社会的相对分离；经济社会由封闭转向高度开放；政治运行机制的公开性有所提高。所有这些，都可归结于增长基础上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增长，首先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由外资促进对外贸易，再由贸易引领GDP增长的过程。其次才是一个在开放进程中促进国内改革，放松对产权、就业等诸多领域的管制，由此培育和扩大市场力量的过程。对增长的贡献，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

这种增长模式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速扩展，以及这一浪潮里跨国公司为追求生产效率，注重在全球范围内以生产要素为基础进行专业分工和配置产业价值链，从而使中国这样的大型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机会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和贸易中。

这一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比较优势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那种以最终产品为内容的竞争优势很不同：首先是缺乏内生性自主创新体系和拥有知识产权的自主竞争性品牌，只能为那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全球生产链服务。其次是外资占据了本土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知识与技术、品牌、贸易渠道等多种因素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而中国只能通过单一的劳动力因素参与分配，因其廉价而所获甚少；更由于土地、环境、资源、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从而使只占资本总额30%的外资，拥有了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

与此同时，除去外资占据的领域，近70%的本土生产性资产和几乎全部金融资源，以国有独资和控股经营的形式，掌握在政府手里。伴随政府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支撑的国有企业大规模持续投资，也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这种增长模式的结果，外资和政府资本挤占了本土民营资本应有的投资机会，经济增长成果主要被外资拿走，然后是国有企业及政府财政，民营资本和普通大众所获最少。鉴于分配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在导致国民收入、城乡差距及分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均小于GDP、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同时，造成了本土高储蓄率、低消费能力的局面。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很难在这种格局中大幅上升。

限制本土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削弱其积累和再投资能力，也就限制和削弱了本土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建设的能力。弱小的本土消费能力和大幅下降的投资能力，当然无法使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由内需驱动的增长经济体。更为要紧的是，一旦全球化浪潮的扩展速度趋于缓慢，甚至停滞和逆转，依赖于外资及其促动的贸易的经济增长，也将下降、停滞和逆转。

中国增长模式的脆弱性由此可见。尽管这一模式的增长增长速度很高，但对本土国民与社会而言的发展，却是严重不足而滞后的，因而这种增长模式的发展效果并不高。因此，无论是为了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还是为了提高增长的发展效果，都必须转变中国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并已开始行动了。但从2005年提出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和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政策口号到现在，人们尚未看到切中要害的政策措施和明确具体的指导思想。

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一句话，就是由比较优势战略转为竞争优势战略，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生态链上的层次。由本土自主产品和满足内需甚至外需。而解除约束内需的真正要害之处，在于分配制度的大力改革，以及取消对民营资本的一切限制，并给予应有的政策鼓励和支持。

放开民营资本的一切限制，可加强其作为中国自主创新和有品牌建设支撑的力量，在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上层次的过程中，既可增强抵御外部不利变动的能力，又可增加本土要素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提高国民收入水平。这除了在投资领域、税收政策上的一视同仁甚至有所优惠外，更需要发展一个稳定有效的本土金融市场，在促进中国高储蓄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形成的同时，确保民营资本投资能力的可持续性。

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经济平等的社会。而经济平等的社会，必然会支撑起不断扩大的内部需求。如果大部分国民收入掌握在政府手中，必然会挤占民众的消费与投资。如果大部分收入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很容易使本土产品市场过早饱和而而有效需求不足，且不用说还会引起社会紧张和冲突。中国当前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平等，更出现了因为蛋糕切法不合理而使得蛋糕不再扩大甚至缩小的趋势。所以，无论是出于扩大内需，还是为了社会和谐，都到了必须大力改革分配制度的时候了。

只有分配制度改革到位，并下大力气鼓励支持民营资本发展，才能够从根本上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增强在诸如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中的主动性，并使国民收入与GDP的增长相适应，促使经济增长更快地转化为以结构升级和优化为内涵的发展成果。如此，则中国有望进入一个真正高效发展的时代。